

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编者按】历史活动的中心是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故长期以来,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处于中国历史上的过渡时期,因而带来近代人物评价的复杂性。21世纪以来,围绕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贬低,甚至否定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二是拔高,甚至肯定近代中国开历史倒车的落后人物。这两种错误倾向,值得学术界加以关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有过深刻而全面的阐述,对人类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做了经典性评价,树立了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标准。故在中国近代人物评价问题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全面掌握翔实而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对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及各方面人物进行宏观考察,将其置于近代中国历史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为此,本刊邀请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四位权威学者,对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评价问题进行专题探讨,以期推动更多学者作深入思考。

唯物史观与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思考

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评价民国人物的几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唯物史观不是一般的历史观,而是看待历史的总的观点,是分析历史的总的方法。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研究历史,要找出历史的规律性的认识,要找出历史前进的方向,要看到历史的本质,不要被历史的许多表面现象所迷惑。怎样用唯物史观指导民国历史人物研究,是一个大题目。我没有深入研究,谈一点个人想法,请学者批评指正。

民国时期很短暂,从1912年到1949年,只有38年,如果从历史上的朝代角度看,那只是一个短暂的“朝代”。1949年至今,中国现代的历史已经走过了70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已经超过了70年。我们今天有信心说,民国历史只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代。我们分析和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这是一个角度。

我们不能因为民国历史短暂而轻视它。我们也不能用旧朝代的观点看民国历史。民国是推翻清朝皇帝制度后建立的,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试图在中国建设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不很成功,孙中山后来也对它很不满,但民国在本质上与封建帝制的旧朝代是有区别的。民国是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间的过渡时代。没有民国,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直接从清朝产生。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制国家不能直接接续封建时代,只能直接接续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国时代。

这个认识,我以为是在讨论民国历史人物评价时,必须明确的历史前提。

我在思考中国近代史的规律性进程时,提出了近代中国经历从“沉沦”到“谷底”再到“上升”的基本规律。我认为这是观察110年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之一。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是近代中国历史不断“沉沦”的时期。从《辛丑条约》签订到1920年,是近代中国“沉沦”到“谷底”的时期。经过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经过了中国共产党“一大”和中国国民党“一大”,近代历史明显出现了“上升”趋势。“上升”趋势最明显的标志,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共“二大”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目标;二是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明确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明显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但是“上升”的道路不是顺情直遂的,“上升”中也有曲折,有时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的。在我看来,十年内战时期是“上升”与“沉沦”的交织,“沉沦”因素略占优势;八年抗战时期主要是“上升”因素起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上升”与“沉沦”相交织,“上升”因素起了主导作用。这三个时期有一个核心问题:反帝。坚持反帝,代表着“上升”;放弃反帝,代表着“沉沦”。十年内战时期,蒋介石及其所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放弃了反帝,它代表的是“沉沦”的力量;中共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仍旧坚持反帝反封建,它代表的是“上升”的力量。抗战时期,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政府虽有动摇,仍坚持了反帝(抗日),这代表着“上升”;中共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抗战,中共主导了抗战时期的“上升”趋势。所以说,抗战时期的总的趋势是“上升”的。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及其政府在美国支持下,坚持反对和平、发动内战,要消灭中共主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中共坚持和平,反对内战,赢得了全国民心,也赢得了内战,赢得了全国的和平。显然,这个时期代表“上升”趋势的只有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要强调一句,“上升”时期虽有曲折,但“上升”的历史趋势谁也改变不了。民国时期恰恰处在“谷底”后期,以及从走出“谷底”转到“上升”的时期。在思考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时候,应该参考这个基本规律。民国时期虽然短暂,道路曲折,活动在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存在着各种面相。

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近代中国面临着民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的共识。民国时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组成部分,分析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也要放在这个框架下来认识。当然可以主张现代化视角,用这个视角看历史人物,也与国家要富强的历史任务相契合。但是,只强调国家要富强,忽视民族要独立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把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分割开来是不可取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不符合历史事实。评价民国历史人物只强调国家富强的一面,忽视民族独立的倾向是不可取的。

以上所述,反映了民国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基本观点或者标准。其一,是历史前进的观点和历史发展的观点。顺应历史前进的人物、推动历史前进的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一般来说,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肯定的。由于民国时期是历史的过渡时期,本身存在着曲折性、反复性,有的曾经起过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人,在某个时期又起过相反的作用。在评价这样的历史人物时,就要分析,这个人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大呢,还是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如果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肯定他;如果拉历史后退的作用更大些,我们就要基本上作出否定的评价。

其二,历史联系的观点,即把握历史事实的全部总和,从全部总和的认识中联系具体的事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建立宏观与微观的联系。任何一个个别事实都可以建立某种观点,如果这个个别事实不与历史的全部总和相联系,那样的个别事实是没有价值的。我们不拒绝“碎片化”,也就是历史细节,只要这种“碎片化”或者历史细节是与全部事实的总和相联系的,就是好的,否则,这种碎片

化的东西真好像断了绳索的一串铜钱一样,洒在地下,让人看不出所以然来;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渺然飘去,无所踪迹。这就是说,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拿他一生的主要业绩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连接起来。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肯定,不符合这个历史总趋势的就要否定。总之,要做出具体分析。

其三,阶级的观点,阶级的分析方法。这在讨论民国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不可忘记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主线或者历史主题是反帝反封建,这是无可否认的。凡是站在反帝反封建一边的历史人物,就是革命的,或者就是支持革命、同情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的正义一边;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边的,就是反革命的,或者不革命的,换句话说,就是站在人民大众对立面的,就是站在历史的非正义一边,是开历史倒车的。用阶级观点看问题,还要指出,要分别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系与区别。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一般是要肯定的;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更是要肯定的。我们注意到,有的投身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人,接着继续革命,又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有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有贡献,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持反对立场,这就需要做出分析。

我们看民国人物,不能只看国民党方面的人物,还要看共产党方面的人物,还要注意第三方面的人物。第三方面的人,有的依靠国民党而走向失败,有些跟着共产党走向胜利。民国方面的人物,除了政治、军事方面,还有经济、科技,还有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人物,我们都要依他们各自的表演,看他们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逆历史前进方向,判定他们是历史前进的正能量,还是负能量。

我个人以为,评价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只要掌握了上面几个基本点,就是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二、几个民国人物的评价

结合几个民国历史人物的评价,谈一点看法。

孙中山,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起到了推动作用。孙中山一生虽然不无缺点,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言,他基本上是一个应该全面肯定的人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大体上分为筹划辛亥革命的旧三民主义和提倡国共合作的新三民主义,他的思想是在前进的。如果从理论的角度来批评,孙中山三民主义学说漏洞还是不少的。所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不同历史时期,往往被不同政治立场的人所利用。

袁世凯,在推动清末新政方面起了促进作用,客观上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有好处,但清末新政的主观目的是挽救封建朝廷的统治。袁世凯在判定革命势力难以阻挡时,在促成宣统皇帝退位上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他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违背自己赞成共和的誓言,镇压革命派,妄自称帝,是严重的历史倒退行为。辛亥革命打开的历史进步的闸门,被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打乱了。“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是革命党人事后的反思。辛亥革命本来可以作为近代中国“上升”的标志,被袁世凯的称帝抹黑了,导致了民国初期的混乱局面。如果没有称帝行为,袁世凯大体上还可以作为一个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来评价。因为有了称帝,袁世凯只能是一个拉历史倒退的人物,是一个被历史否定的人物。

溥仪,清政府被推翻时,只有6岁,很难要求他个人对历史负责任。但是,他作为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肯定他。1932年他在日本胁迫下建立“满洲国”,成为“康德皇帝”,配合日

本帝国主义肢解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考虑到他在新中国被改造成成为新人,政治态度有根本转变。盖棺定论,可以给他一个稍微好一点的评价,但那时他已经不是民国人物了。

黎元洪。我觉得从辛亥以来百年历史的角度,评价历史人物黎元洪有必要说三句话:第一句话,黎元洪在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以后乃至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大总统期间,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而言,有大功无大过。第二句话,在此期间,无论是对湖北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的认识,都有过错误,但是对于坚持和维护共和而言,都是小过。第三句话,在武昌起义后成为全国瞩目的政治家,他未能做好思想准备和必要的历练,在治国理政上,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不能成为一个治理转型期大国的有作为的政治领袖。

对黎元洪来说,他拥护共和、坚持共和、维护共和,最重要的表现是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黎元洪无法反对袁世凯称帝,但他可以坚持自己民国副总统的立场。这在中华民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是一个向前看还是向后看的问题;是坚持民国副总统,还是接受洪宪帝制的“武义亲王”,这是一个历史大关节,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这是涉及推动历史向前进,还是拉历史倒车的大问题。我们评价历史人物,就要看在历史的大关节点上,是坚持历史前进的方向呢,还是向后看,走历史的回头路。在这里,黎元洪和袁世凯,代表了两个不同时代的人,一个是新时代的代表,另一个则是旧时代的代表。新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肯定,旧时代的代表为历史所唾弃!

蒋介石,无疑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在民国历史上起过十分复杂的历史作用。他1924年受孙中山之命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开始在政治上崭露头角。1925年起,投入东征、北伐,著有战绩,成为晋升之阶。1927年至1949年,统治中国22年,是民国时期在国家负责岗位上时间最久的领导人。1949年后,长期主持中国台湾政务,直到1975年去世。作为民国历史人物,在蒋介石生前或者身后,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各异,全盘肯定者有之,全盘否定者亦有之。在今天,不仅在中国大陆,就是在中国台湾,也是众说纷纭。总的趋势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当初国共对立政治的逐渐淡化、冷却,随着各种档案史料的公开,学术上的研究,逐渐走向客观。这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也是学术发展的正常现象。对蒋介石的评价,我考虑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高举反帝除军阀的旗帜,以北伐扫除北洋军阀时期的混乱局面,谋求中国的统一,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任何党派和个人适应了这个方向,就是进步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这个时期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对历史是有贡献的。1924—1925年,他支持过共产党。孙中山在世时,他发表过很多左倾的言论。他在日记里写过,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都是革命党。他仿照俄国革命,把中国国民党称作布尔什维克,要起领导作用。既然都是革命党,就应该携手并进“打倒列强除军阀”,但是到了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他的态度就起了变化。他是用左派的面目掩盖了中右派的实质。他利用广东湖南农民运动的胜利气势支撑了他东征北伐的成功。他担心共产党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他的反共面目逐渐暴露,1927年4月就对中共反目,发动反革命政变,夺取了国民革命的完全的领导权。南京政府建立后,他又花了十年时间妄图“剿灭”中共。如前所述,十年内战,他完全放弃了反帝方向,致力于对内消灭敌对势力,主要是消灭共产党。他在这个时期的“努力”,是完全违背历史发展方向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是从中华民族的全体利益出发,还是从党派的利益出发?凡是从中华民族全体的利益出发,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自由发展前途的党派和个人,就是符合历史前进方向的,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他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是错误的;在全面抗战期间,抗战第一,反共第二,虽然把抗战坚持到底,但他不积极支持共产党抗日,不积极支持发动人民群众抗日,还存在破坏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发动了几次反共高潮,以皖南事变达到顶峰。可以说:在全面抗战期间,蒋介石功略大于过。

第三,经过八年艰苦抗战,赢得了抗战胜利,人民盼望和平,是组织各党联合政府,走和平民主建国的路,还是坚持走一党专政、个人独裁的路?只有坚持联合政府主张、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党派和个人,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蒋介石在这个时期,用重庆谈判、政协会议掩盖他的反共面目,不接受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坚持反共路线,调兵遣将,一意孤行地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消灭共产党。发动内战是丧失民心的,结果许多中间党派和知识界人士都站到中共一边。共产党用并不精良的武器,靠千百万老百姓支持,在战场上消灭了远多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不仅共产党没被消灭,由于丧失民心,蒋介石、国民党得不到民众拥护,无法在大陆立足,残部败走台湾。在这个时期,蒋介石没有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而是逆历史潮流的。

第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美国干预下形成海峡两岸暂时分离的局面,是坚持一个中国,坚持中国统一的方向,还是放弃一个中国原则,走台湾分裂的路,这也是评价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原则。蒋介石坚持了民族立场,抗拒了美国“台湾地位未定”的政策,也坚持了一个中国原则。蒋介石的这个立场是可取的,同时,他坚持“反共复国”的立场也存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一场国内大革命的结果,国民党政府被彻底推翻,残余力量逃到(台湾地区习惯于用“播迁”来掩饰)台湾地区,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南明残余势力。从国际法来说,由于国内革命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国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历史遗产,包括属于它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这就像中华民国当年推翻清朝政府一样,民国继承了清朝的土地和人民以及一切属公物件,尽管当时台湾还在日本统治下。1945年日本战败,按照《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退出台湾,台湾回归中国。1949年后,尽管还有曾经代表过中国的一些人打着“中华民国”的旗号盘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上,而且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支持,还在联合国占据着新中国应有的地位,但是从法理上说,在台湾的那股势力已完全丧失了代表中国的权力。中华民国的法统被国内人民大革命完全推翻了,中断了。

对这个客观事实,蒋介石心里清不清楚呢?他是清楚的,尽管他口里不这么说,日记里也不这么写。支持蒋介石的美国人(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这一点清不清楚呢?也是清楚的,甚至比蒋介石更清楚。这里仅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旧金山和约”谈判取得基本共识后,美国安排日蒋之间“议和”,日本政府服从美国对华政策并从自身需要出发,不承认台湾“政权”代表全中国,在与台湾当局签订的“和平条约”中明确规定该条约只适用于台湾“政权”控制的地区。这是所谓“吉田书简”的基本精神,这个所谓精神,又是美日两国之间一致认同的。但是,蒋介石并不认同这一点,而是坚持“台湾当局”代表全中国。蒋的这个想法实际上是一个虚幻的想法,在对日谈判中面对美、日的压力,不能不接受日台条约“适用范围”问题,不能不在“适用范围”这个现实面前低头,不能不承认自己不能代表全中国,乃至在文字表述上有所乞求。

回到人物评价上来,蒋介石及其一伙占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小块土地,抗拒统一,虽然他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个立场却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这是应该给他正面的评价呢,还是负面的评价?

1949年以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主题性来说,他已经不是民国人物了。虽然他在台湾还挂着“中华民国”的招牌,按照中国历史的正统论,那个“中华民国”已经是伪的了。

我认为,从盖棺论定来说,如果简单地以功过论,蒋介石过大于功。有人评价蒋介石,有大功,有

大过 给人以功过平分的印象 似乎很公正。不惟别人 我过去也有过这种想法。如果用唯物史观来衡量 这种两分法是形而上学的 缺乏辩证法思维 缺乏对蒋介石一生综合地分析 不能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去分析人物。貌似客观公允 其实是不够客观 不够公允的。有人拿毛泽东说蒋介石抗战期间躲在峨眉山 抗战后要下山摘桃子的比喻 批评毛泽东的说法不科学 在这种语境下对比毛与蒋 正面为蒋介石评功 这是欠妥的。蒋介石、国民党在 1938 年武汉失陷以后是否消极抗战 是否发动反共高潮 是否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其答案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做根据的。1938 年以后 蒋介石、国民党在重庆大后方 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敌前线 抗战胜利后 却不准许八路军就近收复失地 只能由国民党独占胜利果实 把它比喻为下山摘桃子 不是很形象吗?

汪精卫 跟着孙中山从事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活动 是有贡献的。在国民党“一大”前后 也是有贡献的。关键是 九一八事变后 他凛于日本的强大 丧失了民族自信心 组织“低调俱乐部” 反对民族抗战 全面抗战开始不久就投降日本 在南京建伪政府 为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效劳 大大削弱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他是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

毛泽东 也是民国历史人物 他一生一半跨在民国时期 另一半跨在社会主义时期。在民国时期 他是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历史人物。虽然在共产党内几起几伏 但是他始终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一边 力挽狂澜 推动历史的前进。他个人虽然有缺点 对历史的具体判断不一定十分精准 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是很到位的 他是无愧于历史的。新中国的样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样态 中国共产党的样态 基本是按他的思想来确定的。他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贡献 超过了孙中山。如果加上社会主义时期 盖棺论定 毛泽东的评价可以三七开 也可以二八开。他的历史功绩是彪炳史册的。

陈独秀 是一个比较悲剧性的人物。他在清末从事反清运动。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是领导人物 是中共第一任领导人。他在推动国共合作中是有贡献的。但是 中共还在初期发展中 与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的合作缺乏经验 又无法反驳共产国际依据自己的经验发出的一系列指示 在国共合作后期犯了错误。在中共发展的初期 这种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党内 与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一起 继续奋斗。但是 他秉性刚烈 受不得夹板气 个人英雄主义严重 由失败滑到怀疑马克思主义 走上托洛斯基道路 这个错误是严重的 也是令人扼腕叹惜的。抗战期间他坚持抗日立场 虽愿意回到中共 又不愿意检讨错误。盖棺论定 他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初期的贡献还是要肯定的。

周佛海 是中共“一大”代表 后来投入国民党 再后来投降日寇 成为汪精卫的左右手。此人当然不可正面评价。

张国焘 是中共早期领袖人物 在中共发展初期起到了重要作用。虽然在党内错误不断 个人英雄主义强烈 在红军长征后期犯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如果留在党内 检讨错误 继续奋斗 犹不失为一个正面人物。关键时期走错了一步 投降国民党 背叛中共 成为一个不可挽救的人物 一个不可正面评价的人物。

张澜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民国成立后反对袁世凯称帝。1941 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 张澜任主席 积极靠拢中共 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 他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独裁。1947 年与中共一起 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 民主同盟旋被国民党政府宣布非法。1948 年宣布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积极参与筹建新中国的活动。新中国开国 成为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都积极投身的人士 是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人物之一。董必武、吴玉章也是这样的人 区别只在于 董、吴二位在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信仰了马克

思主义,成为中共的创党人物。

郭沫若,是民国时期左翼文化人的代表。国共合作时期,他是积极的参加者。十年内战时期,他被迫逃亡海外,埋头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方面,做出了表率,被称为“中国的恩格斯”。抗战时期,他回国参加抗战,成为国内文化战线的领导者。作为民国时期的左翼文化人,他是一个完全值得肯定的人物。

陈寅恪,出身官宦家庭,祖父陈宝箴曾任清末湖南巡抚。他是历史学家、大学教授、唐史专家。他在历史大势上信任共产党,不愿意跟着国民党去台湾。终生研究历史,不信仰马克思主义。记得2006年3月我在胡佛研究所看中国驻纽约前总领事张歆海档案时,看到陈寅恪在香港写给张歆海的长信,表示生活困顿,对前途极悲观。这大概是他选择留在大陆的思想因素吧。像陈寅恪这样的知识分子,愿意留在大陆,跟着共产党,尽管不信马列主义,还是一个值得正面评价的人。

三、余韵

1. 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立足整个民国历史时期,既要评价国民党人,也要评价共产党人,还要评价其他政治身份的人士,也包括学术界人士。评价标准基本是一样的。不要以为,只有国民党人才是民国人物。极少数人在网络上赞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形成所谓“民国热”,那只是一种虚幻的外表,不反映真实的情形。

2. 虽然民国时期是从“谷底”走到“上升”的时期,民国时期毕竟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又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时期。评价民国历史人物,要正确拿捏这个历史时期的定位。如果存在用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贬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种取向是不可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各种人物的成长,等等,都是民国时期不可企及的。

关于历史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

耿云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要研究历史,就不能不研究人,研究那些创造历史活动中有所作为、发生影响的历史人物。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写历史的书,无不以大量的篇幅谈论人物,中国历史学经典就是明证。比如《史记》,司马迁在书中设本纪、世家、列传,都是讲人物的。以后的官修史书也都与此大同小异。近代以来,历史书写方式有很大变化,但写人物,仍是所有历史书写者都避不开的。近几十年来,因思想解放,许多禁区被突破,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进入史学家的视野。于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大量出版,历史人物的日记、书信等大量地被发掘出来,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专门研究历史人物,已是历史研究的一大主题。即使不是专门研究人物,你也无法回避一些重要人物的生平事业。如你研究近代经济史,不能回避搞洋务实业的盛宣怀、搞大生纱厂的张謇、搞铁路的著名工程师詹天佑,如此等等。搞近代政治史就更不用说了。搞军事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学艺术史,等等,无一例外,都要和历史人物打交道。所以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内容。

下面根据我几十年来从事近代史研究的经验,略谈谈我对历史人物研究的一些体会和心得。我想从五个方面来谈。

一、历史人物生活的背景

(一) 时代及地域的背景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人是他的生存环境的产物,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环境。

近代的大幕拉开以前,中国人自以为是天下唯一的文明大国,完全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的与中国相若的,甚至高出中国的文明。一旦大幕拉开,突然发现还有许多跟我们一样发达甚至更为发达的人类文明。而且这些文明的国家、民族,正以他们各种中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明的产物——大炮、军舰、远距离射击目标的步枪等来攻击我们,强迫我们打开国门,设置口岸,签订不平等条约,甚至赔款割地。这真是数千年未曾有的大变局。这时,清朝统治在内部也早已现出因腐败而造成的种种危机。于是,这一代中国人都生存于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之中。凡略能读书看报、稍有公共观念的人,便不能不面对这一大变局而产生某种应对的心理和态度。一些人为危迫的环境所激,切望以急风暴雨式的手段,以求改变现状。另一些人,可能倾向于针对现存的问题做逐步的改革,以求消除危机,走上向前发展之路。还有一些人,则因与现存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希望维护现存秩序。这三种政治取向是研究晚清历史的人所熟知的。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人物,都跳不出这个范围。

到了民国年间,仍然有三种政治力量在社会大舞台上较量。因为没有哪一种力量取得绝对优势,民国政治一直没能走上轨道稳定地运行。极端保守的力量以为,既然共和国不能救中国,那就复辟帝制好了。袁世凯的复辟与清朝皇帝的复辟,都曾表演过,都失败了。激进的力量则主张以暴力的手段,打破现存秩序,建立新的社会秩序。革命党,先是孙中山的革命党,后来的共产党,都是如此。还有一些人,包括一部分晚清时期过来的改革派,以及大多数工商业者、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等等,他们主张在共和国体之下,循名责实,用和平改革的手段逐渐达到真共和的地步。

我们研究近代史上的人物,必须对上述的基本背景有清晰的认识,才能更好地把握该人物所处的历史地位。

以上是就整个国家的背景而论的。还有地域的背景也很重要。古代人非常重视一个人的郡望(或称地望)。我们国家幅员广大,各地域,其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很有差别。我们这里无法详细分析各地域的差别,只想强调一下,与近代史关系至为重要的一种地域差别,那就是,南方珠江口岸与长江口岸所带动起来的近代化运动造成的人文优势。从清末以来历次发生的革命运动、改革运动,几乎都是从这两个地域发生出来的。看一看历次革命运动、改革运动的领袖人物、骨干分子,其绝大多数都出于这两个地域:珠江流域的两广,长江流域的江、浙、江西、安徽、两湖和四川。北方虽然也出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但多半是因某种机缘与南方领袖分子有所接触,真正“无文王亦兴”者,甚为少见。

(二) 家族与家庭的背景

家族和家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历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人成长的第一个既定环境就是家族与家庭。社会发展程度越低,社会公共教育发展的程度越低,家族和家庭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越大。我们举两个明显的例子,康有为和孙中山。康后来成为改革派的领袖,而孙是革命派的领袖,家庭环境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康有为出生在南海县一个官宦之家。他的曾祖父曾做过福建按察

使,他的祖父做过连州训导,并死于任上。他的父亲,则做过江西补用知县。他的一个从叔祖做过广西布政使,一度护理广西巡抚。这样一个家庭,可谓“世受国恩”,很难与之断然决裂。但国家深处危机之中,不能不有所改变,以图救国救民于水火。所以,康有为走上追求改革的政治道路。孙中山出生于香山县一个临近香港、澳门的村庄中的一个农民家里。这一带,广泛流传着太平天国起义的故事,听惯了这些故事的孙中山,少年时,即以洪秀全第二自命。他目睹民不聊生、国家危亡的现状,颇想继承洪秀全的事业,来一番改天换地的革命运动,推翻清朝另建新国。他成为兴中会、同盟会的领袖。

当然,不能把家庭背景对一个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绝对化了。比如说,若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始终得不到皇帝的赏识,再加以许多事情刺激他,逼迫他往激进的路上走,恐怕也难以保证他不滑向革命的路。又比如,若孙中山给李鸿章的上书,得到李鸿章的激赏,把他留在身边,那也许就没有创办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事了。历史不能假定。我们这里只是要说明,不可把家庭出身及其影响绝对化。只要这些影响没有遇到更为强大的其他影响给与抵消,甚或令其反转。那么,这种家庭影响就是十分重要而不可忽视的。

(三) 教育的背景

一个人所受教育,与他一生的思想、事业关系甚大。我们研究一个历史人物,不可不注意他的教育背景。

一般说来,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其所受教育都经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两段历程。旧式教育就是家塾、村塾、书院之类;新式教育就是学堂,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大学,有的还出国留学。

旧式教育并非都是一样的,不同的学塾、不同的书院,乃至不同塾师、经师,其对学生的教育旨趣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试设想,若梁启超在学海堂终其学业,他可能一生只是一个做旧学问的学者。但他中途离开学海堂,跑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听那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的一派改革者的呼唤,于是,他走上了改革中国政治的道路,同时又成为贯通新旧、兼采中西的学者。

经历过由旧式教育到新式教育的完整过程,从而成为新思想、新文化引领者的代表人物,在各个领域都出现过一些。例如自然科学界的丁文江,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胡适,教育界的蒋梦麟,等等。其中,胡适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胡适生长在徽州绩溪,徽州古为新安郡。新安曾是朱熹讲过学的地方,其影响极为深厚,向有“东南邹鲁”之称。同时,这里又是清代考据学大为兴盛的地方,以致蔡元培、梁启超都曾误会胡适是著名考据学者“绩溪三胡”之后。胡适幼年在家乡接受了九年旧式教育,对于传统儒学,对于考据学的治学精神与方法,肯定是寝馈多年有所心得。他在应官费留美考试时,能做出一篇得满分的考据文章,绝非偶然。

胡适14岁到上海入新式学堂,他先后学习过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都是当时很有名的学校。在上海读书的六年,使他成功地从旧式教育转到新式教育。这期间,他的英文打下很好的基础,又因主编过一份刊物,受到白话文的良好训练。而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则为他打开了新的知识与学问的世界。有了这样的基础,胡适于1910年到美国留学,可以说,他具备了去理解和接受一个新世界,以及它蕴蓄千百年的一套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所需要的条件。

胡适在美留学七年,是他有意识地为自己的一生事业做准备的过程。他和绝大多数那个时代受教育的中国青年一样,目睹国家危难立志报国。只是其选择的途径不同。他不赞成激烈的暴力革

命,他主张通过和平改革,为新社会造就新的基础。他认为,暴力革命固然可以由建立新政权而改造社会,但这个改造过程还是避不开一步一步地改革,以造就新社会的基础。从他的这个基本观念出发,整个留学期间,他都有意识地为自己积蓄能力,为将来造就中国的新社会、新国家做准备。也是基于此,当他学成归国的时候,打定主意,要为国家政治改革建立思想文艺的基础。他与北京大学以及《新青年》的陈独秀等人相携,从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入手,掀起一场以思想革命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一生的事业都是在这场运动出发的。从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所受教育,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二、准确把握住人物一生的追求

一个人一生的追求是贯通一个人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没有这个中心,就像没有灵魂一样;有了它,就是一个有灵魂的人,一个生动、鲜活的人。

但要准确抓住这个中心,谈何容易!必须相当全面地了解人物一生的思想活动,仔细作出分析,发现可以贯通其一生的基本线索。这时,才有可能充分理解这个人物一生的根本追求是什么。有鉴于此,要研究一个人物,最好是在占有充分材料的基础上,先编出一个年谱,然后再动手写他的传记。当年梁任公先生去世,十分崇敬梁先生的丁文江就先动手搜集材料,编出一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来。至今学界都公认,这部年谱长编极具学术价值。可惜,此年谱初稿刚刚完成不久,丁文江先生就病逝了。否则我们本可以看到一部非常好的梁任公先生的传记。

梁任公先生一生的追求就是建立起一个实行宪政的国家。他经常说,一个国家,有无君主,是否共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实行宪政。能实行宪政,有君主也仍是现代国家。不能实行宪政,虽名为共和,仍够不上现代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宪政是一切依宪行事。他解释说,在宪政之下,人各有权,权各有限。你贵为君主,也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行事。你贱为平民,你也拥有宪法规定属于你的权力。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威胁一个国家正常运行的,从来不是百姓不守法,而是官员不守法、统治者不守法。只有行宪政,才能真正把官员、统治者关进笼子,让他们不敢不守法。关键是要有这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经过人民认可的宪法,和保障宪法能够实施的一套设施。没有这个笼子,指望官员守法,指望统治者守法,那是不可能的。

与梁任公相反,袁世凯一生追求的,只有权力。他十几岁随嗣父到当差之地读书时,就帮助打理各事,从中了解官场各种情形。22岁,凭借父辈的关系,进入军界。凭他熟谙官场规矩,又确有办事能力,从此一路攀升。到1895年,竟获得主管小站练兵的重要使命,从此有了自己经营的军事力量。以后陆续升任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以后又进入军机处,因丁未政潮而一度被免。不久再度出山,再度被免。清朝末年,旦夕危亡的险象,稍有识者都看得出,以袁世凯的聪明,他当然非常清楚。他1909年再度被免之后,回老家做涇上钓翁,为韬晦之计,心营目注,觊觎新的机会,向最高权力进逼。

辛亥革命爆发,袁氏看到了机会。这时,无计求活的清皇室,想招回袁世凯,帮助解难。袁的几位好友也劝他抓住机会,赶紧出山。于是,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总揽军政大权。他派人率领由他训练起来的新军攻打革命军占据的武汉。当时革命阵营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孙中山在海外奔走各国,天真地希望得到西方列强对于革命党的承认,不肯回国。黄兴到武汉支应一阵,感到力不从心,离开武汉。袁世凯的军队顺利打下汉阳之后,革命军形势甚危。但富于心计的袁世凯却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停下来与革命党和立宪派联合的南方势力举行谈判。

这里必须注意,此时的袁世凯,已不满足于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他要猎取国家最高权力。他此时如果乘胜追击,消灭革命军,可以挽救清朝,他自己不过成为清皇室的一大功臣。如果他居功而逼使清朝皇帝退位,那他将背上叛臣的恶名。他以不败之军事实力,与南方谈判,进可以要挟南方势力答应对自己有利的条件,退可以借南方势力,逼使清朝皇帝退位。他左右逢源,其结果是南方势力答应,只要清朝皇帝退位,袁世凯宣誓赞成共和,就推举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一切都合乎袁世凯的如意算盘。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围绕着大总统的任期、连选连任的方式、继任总统的选出方式等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他的最高权力。为此,他后来竟至走上复辟帝制之路。

所以,我觉得,要写袁世凯的传记,必须抓住他一生都在追求权力,直至国家最高权力,这是贯穿他一生思想活动的中心。

三、关注重要的人际关系

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其事业的成败利钝,都和他的人际交往有重大关系。胡适的一生是最好的例证。胡适的文学革命思想是在美国读书时,在与朋友们相互讨论与辩论中酝酿出来的。胡适尝说,他的新诗创作,在美国读书时是得任鸿隽、杨杏佛、朱经农、梅光迪和陈衡哲几位朋友的帮助和激励;在北京时,是得沈尹默、钱玄同和刘半农等几位朋友的切磋。没有这些朋友,就不会有他的新诗创作,也就不会有白话新诗的尝试成功。至于文学革命的发动和取得成功,更是许多朋友努力奋斗的结果。胡适在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功、发挥的影响,没有一项不曾得到朋友的赞助。他在推动北大改革方面,深得蔡元培的赞助和支持,以及蒋梦麟、陶孟和等人的助力。他在学术事业上的成功,得到他的朋友(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丁文江、唐钺、高一涵等)和他的学生们(如顾颉刚、傅斯年、俞平伯等)的大力支持。胡适最懂得朋友的重要,所以他说“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人们都知道,民国时期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口头禅,叫做“我的朋友胡适之”,可见其交友之广。

大凡作出一番事业的人,都有一批得力的朋友和帮手,如袁世凯身边和麾下文有徐世昌武有段祺瑞等一干人马。这些人,在他取得灭亡前的清廷军政大权,以及随后攫取民国大总统的地位时,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当袁世凯谋划帝制复辟时,最重要的文臣武将——徐世昌和段祺瑞,都离开了他,可见其复辟活动是如何的不得人心,注定必归失败。梁启超从事维新运动时,上有老师康有为,左右有谭嗣同、徐勤等一班干将。海外流亡时期,谋划自立军起义、搞立宪运动,更有一大批朋友和门生帮他拓展事业。晚年从事讲学时,又有更多的朋友和门生帮助他。有些人和他本无师生关系,但感其人格魅力,自愿以门生自居,如丁文江、徐志摩,等等。

所以,研究历史人物,要特别关注他的人际关系。找到这些关系,了解相关人物的主要经历、与研究对象交结的重要事实,了解其对研究对象的思想、活动及其事业之成败产生何种影响。近年来许多报纸、刊物都做成数据存储,又有许多人物的日记、书信发表出来,为我们研究人物的人际关系提供很大便利,应可以使历史人物的研究更有广度和深度。

四、突出重大史实,做必要的心理分析

研究一个人物,要突出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些大事,这是很自然的,不会有异议的。所谓大事,因个人具体情况不同,所处历史地位不同,不可同日而语。有些大事可能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

的,有的只关乎一个地区、一个小社会,甚或只涉及一个具体单位、一个团体。但不管哪种情形,此事件对于研究对象而言,必定是对其思想、事业产生重大影响者,否则不足以称为大事。

一个人面临重大事件的时候,往往需要做出抉择,有的是政治的抉择,有的是事业方向的抉择,有的是关乎身家命运的抉择。而一个人在做重大抉择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很深刻、很复杂的心理过程。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强调必须抓住这些重大史实,并做必要的心理分析,以便呈现出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我在前面讲袁世凯的时候,讲到他在清朝灭亡前的最后关头出山,担任了掌握军政大权的内阁总理大臣一职。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因为此前,他本在军机处的要害位置,光绪、西太后死去,醇亲王载沣为其弟光绪帝报仇,把当年背叛光绪的袁世凯赶出军机处,令其“回里养病”。按常理,袁世凯会怨恨清朝廷,不会在其面临危亡的时候出手相救。但袁世凯追求的是权力,在他看来,这恰是攫取权力的大好机会。所以,他决定出山,接任内阁总理大臣。但是,他南下与革命军作战却又面临一次选择:是一鼓作气,打败革命军,为清王朝还魂续命,做一个有大功之臣,还是做其他的打算。事实上,他是做了其他的打算。这里不再重复。

胡适也可作为一个适当的例子。他一生也曾多次面临在重大历史关头进行抉择的情况,我们这里只将1929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期间,胡适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他所做的抉择,以及1960年前后在台湾雷震案的风波中胡适所做的抉择,作为实例,加以说明。

先说前一个。

这要从1927年,胡适游历欧美之后,经日本回国一事谈起。胡适于是年4月24日到达日本横滨。当时四一二事变刚刚发生,国内朋友纷纷劝胡适暂不要回国。原来,这时的国内,南方与北方在政治上大异其趣,而对胡适却都取不欢迎的态度。在北方,因为胡适赴欧途经莫斯科时,对苏俄印象颇佳,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颇有赞扬苏俄的词句。这些信在报刊上发表出来,北方认为他有亲俄之嫌。更重要的是,胡适的两个重要的朋友,一个李大钊,一个高仁山,都是共产党,已遭到杀害。而且,在枪杀高仁山的官方报道中还特意把胡适的名字牵扯进去。显然,北方容不下胡适。在南方,国民党人还没有忘记胡适支持陈炯明批评孙中山,以及他进故宫见宣统皇帝和参加善后会议的老账,再加上他的好友丁文江曾为军阀孙传芳做上海总办。但比较起来,南方毕竟比北方要多一点新鲜空气,而且胡适的大部分师友都在南方。所以,胡适在日本停留三个多星期,经过观察、思考,发表一篇拥护蒋介石清共政策的谈话之后,回国到上海暂时定居下来。将近一年的欧美之游,回归祖国之后,胡适发觉,国内政治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步。国民党正竭尽全力地建立他们的党国体制,没有什么民主,更没有什么人权保障。他们毫不留情地打击异己,“反革命”的帽子满天飞。在此种情况下,胡适相继发表《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几篇文章,相当严厉地批评国民党,结果招致国民党的大力围剿。在与国民党内一些朋友沟通之后,胡适决定暂时熄火停战,并于次年秋冬,离开上海,回到北京大学教书。

九一八事变为胡适与国民党政权建立良好关系提供了契机。日本的威胁使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思考如何应对日本侵略的问题。政府、党派、团体,乃至个人都一样。1931年11月,恰好新一届太平洋学会的年会在上海举行,胡适以东道国首席代表充任大会主席。在沪期间,国民党人士曾与胡适有接触。当时报纸新闻报道说,蒋介石接见了胡适与丁文江。鲁迅曾以这个新闻为材料对胡适与丁文江大大攻击了一番。实际上并没有蒋介石接见这回事。然而,有迹象表明,曾有国民党官方人士与胡适有所接触,我们从胡适回北平后接到的陈叔通的信可以证实这一点。陈在信中

说“太平洋学会,公速北还,绝无痕迹之好机会,保留独立发言之地位。”^①可见,接触带有秘密性质,以便保住胡适独立发言之地位。胡适回北平不久,联络社会各界人士组织起“自觉爱国会”的团体,其宗旨与国民党当局的对日方针很协调。一年后,胡适在武汉与蒋介石见面。从此,胡适与国民党高层之间建立起可以互相沟通的良好关系。从这时起,直到1949年,在对日、对共产党这种大政方针方面,胡适与蒋介石及其政府有基本共识。蒋介石对胡适也很欣赏,很愿意借重他在海内外、特别是在美国的良好声望。

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权退居台湾后,由于胡适对蒋介石国民党期望过殷,不时批评国民党的专制行为,引起蒋氏大不满。到1960年因胡适的朋友雷震筹建反对党,蒋介石乘胡适在美国的机会,下令逮捕雷震,加之以“通共”“叛国”的罪名。蒋介石想以此达到双重目的,一则镇压岛内反对势力,二则钳制胡适之类自由主义人士的批评。实际上,胡适曾已预见到蒋介石将要对雷震及其筹建的反对党施以严厉取缔措施,曾多次劝告雷震低调行事。但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自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确定要做“国家的诤臣”“政府的诤友”,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与官方立异,但也终不肯放弃独立发言的地位。他在美国,对新闻界,对朋友发言,均强调他可以证实,雷震是“爱国反共人士”。他回到台湾,一下飞机,仍然重复他这句话。后来,雷震被判刑收监,胡适始终未曾去监狱探望。对此,台湾一部分人士,包括胡适所创办的《自由中国》杂志社的几位年轻后辈,都表示不满,认为胡适太软弱。其实,根本问题不是强硬与软弱的问题,而是对自由民主的根本信念上,胡适与这些人有所不同。在雷震案爆发前,胡适曾两度谈论自由与容忍的问题,并强调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认为争自由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自由的力量需要不断地积累,自由与反自由的斗争不是轻易一拼可决的。所以,有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政治哲学其价值如何是另一问题,我们从重大政治关头胡适与政府当局之间的微妙关系,可探知胡适在处理其基本信仰与行为弃取之间做权衡时的心理过程。他始终坚持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但也不因争取自由民主而与在他看来是唯一尚有可塑余地的统治当局决裂。

五、阶级分析与人物评价

常常有人说,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基本观点。这是不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马克思本人曾郑重地指出,阶级与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在他之前,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就指出这一点了。他的贡献是在于指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我们只谈阶级分析的问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许多人不曾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常常把阶级分析抽象化、教条化。往往只追求给一个人戴上“××阶级”的帽子,就满足了。我觉得,阶级分析最重要的是要说明两点:一是在切实把握研究对象的出身、教育、思想及其生平活动的基础上,把人物放到当时社会结构中的适当位置上,呈现出它是属于统治阶级、压迫阶级,还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二是在全面把握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明确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从而判断这个人物是属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还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力量。

这两点,既是对历史人物做阶级分析的核心内容,也是进行历史人物评价的基本依据。至于—

^① 《敬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0页。

个人物,是属于统治阶级和压迫阶级中的哪一个阶层,是属于被统治阶级、被压迫阶级中的哪一个阶层,那是次一层次的问题。自然这一层次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历史是活动的整体,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在活动。所谓历史是各种力量的合力造成的就是这个意思。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常常有些历史书籍,只写某一种力量的活动,而把其他力量的活动视同无物,或最多只是带上几笔。这样的书写,显然不足以反映历史的真相和历史的真貌,给人呈现的,像是“半身不遂”的历史。在这样书写的历史中,人们看到的只是历史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力量在活动,而其他的力量是僵死的,甚至是基本看不见的。我们应当提倡全光谱地反映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要真实地全面地书写历史的活动。

有人担心,全光谱地书写历史,那些推动历史进步、创造新社会的革命和革新的力量就不突出了。这是历史研究者对自身无力的哀叹。我认为,历史上革命的和革新的社会力量,本来就是最活跃,最富于创造力的力量。只要历史家有眼光、有识力、有才具,应该能够把这种真实的历史再现出来。有人以为,历史上,那些革命和革新的社会力量,是靠历史书写者特别努力,才成为历史中突出显现光彩的,那是极大的谬误。

我强调说,不可把阶级和阶级分析抽象化、教条化,就是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说一个人是属于统治阶级的,他就一定只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一个人属于被统治阶级,他就一定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历史上许多在各领域做出有益贡献的人物,是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例如思想家、学者、艺术家,等等。即使是统治者本身,其有些作为,也很可能是有益于社会发展进步的。反过来,被统治阶级其反压迫的斗争,无疑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但是其中某些人的某些具体行为,就未必是有益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如某些农民起义军的过分杀戮行为和破坏历史文化的行为,等等。历史学家要有敢于担当的精神,历史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把它写成什么样;历史人物是什么样的,就应该把他写成什么样。决不能为某种需要而改变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只有真实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只有真实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能提升我们的智慧。只有能从历史中得到智慧的人,才能够更有能力应对未来。

唯物史观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 ——以梁启超为中心

郑师渠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故历史人物的研究及其评价,从来都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近代中国是过渡时代,风云跌宕;近代历史人物的思想也都带有一定的过渡性质。这给近代人物的评价带来了复杂性。在这方面,梁启超具有典型性。他是近代著名的维新思想家、政论家与学者,从22岁开始参与甲午后的维新运动起到56岁去世,一生经历了从戊戌变法到国共合作的国民大革命,即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的历史大变局,几乎无役不与,且“流质多变”。也惟其如此,是非留于后世,迄今难得定论。事实上,随着他1929年去世,见智见仁,不同的评价就出现了。其时的国民政府出于党派的恩怨,不仅拒绝了蔡元培等人关于褒奖梁启超的提议,而且刻意加以贬抑,在社会上制造了某种政治压力。“自梁先生之歿,舆论界似甚为冷淡”。^①人们甚至将参加他的追悼会视同畏途。有人邀一位

^① 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20页。

国民党员的朋友一同去参加追悼会,其夫人不满说“梁启超是研究系的人,是腐化的分子,你若能担保我丈夫的名誉,不发生危险,便同意他到追悼会!”^①所以,其时发表的许多回忆、纪念与评论的文章,几乎清一色只谈任公的学术,而于其政治事功,则噤若寒蝉。同时,在解放前,学界有关梁启超的研究成果,以回忆性、纪念性的文章为主,总共也不过“大小数十篇文章”。^②所以,对梁启超的深入研究与不同意见间的更多讨论,实始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据统计,新中国成立71年来发表的相关学术论文近万篇,2014年有人甚至评论说,“近年来的梁启超研究已日渐成为学界的一门显学”。^③同样,2018年,迄今最为完备的20卷本《梁启超全集》的出版,也反映了这一点。

刘大年说“评价历史人物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假定有那样的公式,我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史学界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虽因受“左”的思潮影响,曾不免于失误;但这无损于唯物史观在指导包括梁启超在内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上所显示出的理论魅力;相反,在今天返本清源的新时代,将愈显其思想的光华。

古人云“知人论世”,意指知人与论世密不可分,欲知人必须先了解对象所处特定时代的背景。这与恩格斯下面的一段话有相通之处“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⑤缘此,可以说,中国史学界依据唯物史观所努力构建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知,首先为科学研究与评价梁启超及近代历史人物,提供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在阶级社会则集中表现为体现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据此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得出了以下的认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传统社会结构瓦解,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新的阶级,先后登上政治舞台。此种社会结构的变动,不仅深刻地影响了近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决定了近代中国社会必然的历史走向: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最终复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1961年,刘大年在《我们要熟悉中国近代史》一文中,这样强调说“在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新的阶级,原有的阶级的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是在这时出现的。中国工人阶级是在这时成长起来的。各阶级在不同时间里的地位,各阶级相互间的关系、阶级斗争的发展,都极其错综复杂。而这些斗争、这些发展,自然又是遵循一定的逻辑,有其客观的规律的。”^⑥

应当说,这是合乎历史实际的科学与正确的结论;今天国人所以坚持“道路自信”,归根结底,是

① 雪林《由梁任公的追悼会而联想到器俄的葬仪》,《生活》第4卷第25期,1929年,第268页,转引自雷平、周荣《“繁华落尽未成空”:梁启超逝世后之时评》,《五邑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② 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

③ 席志武《新视野、新史料、新方法:梁启超研究的新进展——读夏晓虹〈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11期。

④ 刘大年《亚洲历史评价》,《刘大年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⑤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0页。

⑥ 刘大年《我们要熟悉中国近代史》,《刘大年全集》第3卷,第153页。

立足于此。因之,也不难理解,此种“论世”,即对近代中国社会发 展规律的宏观把握,为学界研究和评价梁启超等近代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正确的认知前提。这可举刘大年为 例。1958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戊戌变法六十年》一文,正是从这一认知的前提出 发,对康有为、梁启超诸人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作了如下的评价:甲午战后,“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成了社会生活提出的两个最根本、最迫切的问题”。由于农民斗争处于低谷,中国工人阶级尚处于早期,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于是,寻求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责任,不得不暂时地由资产阶级维新派这个不成熟的力 量承担起来。中国资产阶级发动政治运动便从戊戌变法开始”。康、梁领导的只能是一场改良主义的 运动,这是由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决定的。“这一点是很清楚的:维新运动并不因为是一个改良运动而减弱了它的爱国主义性质”。不仅如此,他还强调,维新运动虽是昙花一 现,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其后60年来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开辟了思想先路,康、梁“维新派是有功绩的”。^①刘大年对康、梁发动维新运动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的评价。当时有人评论说,“对于戊戌政变以前梁启超政治思想总的评价,目前史学界的看法已经是一致了的。这个看法刘大年同志在去年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年的论文中已有了表述”。^②实际上,即便在今天看来,刘大年的上述评价也是完全正确的。这反映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新中国史学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去理解历史人物的命运和评价其成败得失。

为了更好地理解此一评价具有的历史穿透力,不妨将之与蒋廷黻的观点加以比较。蒋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说:近代中国的出路在西化,在朝的李鸿章等“少数先知先觉者”因“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故不敢再进到政治改革,“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康有为只到过香港、上海,看到的江南制造局及教会译的书,也无非初级天文地理格致等书,“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③在蒋廷黻的眼里,戊戌变法运动所以能发生,原因在于主张“西化”的“领袖权”由“在朝”的李鸿章手里转到了“在野”的康有为手里,而且后者较前者胆大,且“绝顶聪明”,懂得“举一反三,因小知大”。将戊戌变法这一影响深远的近代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仅仅归于个别当事者个人的动机与胆识,全然看不到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动及其对上层建筑产生的影响。这显然属于历史唯心论。与上述刘大年从唯物史观出发作出的历史判断相比,无疑失之于肤浅,“知人”“论世”,两不足道。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总是具体的,主观上坚持唯史观的指导是一回事,事实上是否正确地做到这一点,又是另一回事。遗憾的是,1959年“反右”之后,学界在评价梁启超的问题上,受“左”思潮影响愈趋明显。同年的一篇题为《建国十年来关于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的述评文章,虽然肯定了刘大年在前一年发表的《戊戌变法六十年》中的观点,但同时也已透露出了“左”的倾向来势汹涌。

述评的作者写道“戊戌变法维新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的破产。中国社会亦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急剧地向前推进。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梁启超却固守着改良主义营垒,转向堕落与反动,长期地猛烈地反对过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④这种“左”的倾向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将近代不同阶级

① 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刘大年全集》第3卷,第139—143页。

② 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

③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8、79页。

④ 陈匡时《关于对梁启超的评价问题简介》,《学术月刊》1960年第2期。

间的分野与博弈绝对化,看不到历史发展是多化样的统一,而将近代历史发展简单归结为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后退、是与非的二元对立。其集中表现之一就是将戊戌后的梁启超贴上“堕落与反动”的标签,加以全盘否定。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何以陈旭麓1961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说了一句“梁启超思想变化的表征虽多,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他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就立即遭到了一位与会者的训斥,说“戊戌政变后的梁启超,已无改良主义思想之可言,只是全然的反动!”^①此后,越演越烈,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愈益偏离其本意,史学研究成了政治性批判,失去了学术的含量。

直到改革开放,情况才得以根本改观。随着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渐归学术常态。1984年,李华兴在《近代史研究》发表《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长文,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对1842年至1845年间德国思想界的描绘,肯定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英雄”和“思想勇士”;尽管群星璀璨,旋起旋灭,却各领风骚。他说“梁启超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大部分时间能与历史同步前进;正是立宪之志,鼓舞梁启超在戊戌时期奔走呼号,在辛亥前夕推进立宪,在帝制复辟时期奋臂而起;正是新民之道,驱使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成为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晚年还能在教育 and 学术领域成绩斐然。忽视了这一面,就很难正确评价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以及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事物都有它的两重性。物换星移,在阶级分野如此鲜明、历史步伐如此快速的近代,梁启超坚持爱资产阶级的国家,要资产阶级的宪政,搞点滴改良的新民之道,于是进入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也就不能不在政治上落伍,为历史潮流所抛弃。”^②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依然可以感受到当年学术春风扑面和学者心态之宽松与自信。改革开放40多年过去了,如今学界对梁启超的评价早已不再脸谱化,而是愈趋多元化。人们虽然指出了他囿于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戊戌后渐趋落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他依然在多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表示敬意,因而其评价也更加接近于历史的真实。这说明,对于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在廓清“左”的迷雾后,重新又回到了唯物史观指导的坦途。

然而,仍需指出,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之下,也存在着极少数人反对史学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倡言历史虚无主义,非理性的一面。曾经风行一时的所谓“告别革命”论,就集中表现了这一点。究其命意,即在于颂扬改良而否定革命,由此引出匪夷所思的所谓“重新评价历史”的“翻案”风,贬抑革命派,拔高改良派,歪曲历史,不一而足。有人甚至替袁世凯复辟帝制寻找历史的“合理性”:辛亥革命推倒皇权,中国社会因失去了权威主义的重心,陷于瓦解、混乱;袁复辟帝制正是为了重建权威主义,恢复社会重心,故其心可恕。由“左”又转到了“右”:无原则地抬高改良主义与改良派,对梁启超等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异化成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否定。这同样已离学术甚远了,又成了另类的政治性批判。不过,上述非理性的喧嚣,在党的十八大后,逐渐风流云散了。

故上述正反面的事实一再证明:坚持唯物史观及其阐明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是推动梁启超及近代历史人物研究与评价不断深化的前提条件。

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体现了理论与方法相统一。所以,在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上,它不仅

^①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② 李华兴《近代中国的风云与梁启超的变幻》,《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可以在“论世”即把握社会发展大势的宏观层面上,为研究者提供广阔的视野;而且在“知人”即具体分析层面上,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以下不妨以评价梁启超为例,举其荦荦大者。

第一,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这个原则,人多耳熟能详。但是,就具体问题而言,所谓“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不单是指要了解特定的时代背景,同时还强调应有开阔的视野。真做到位,并非易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所以仅仅依据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有批评“科学万能论”和主张东方文明要去“救济”西方文明的话,便认定他欧游归来后,反对新文化运动,复古倒退。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未能将视域拓展到欧洲,注意战后欧洲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因而发生了误读。欧战创深痛钜,欧人开始反省自身的文明,其现代社会思潮因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动。除了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革命论外,一些人则主张反省现代性。他们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逐渐形成了“机械的人生观”,相信“理性万能”、物质至上,结果便造成了人的精神家园荒芜,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终酿成欧战的发生。他们主张尊重人的内心世界,重建精神家园。非理性主义的反省现代性思潮,肇端于尼采倡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而20世纪初年强调精神生活和生命创化的柏格森生命哲学风靡一时,则是其趋向高涨的重要标志。反省现代性思潮虽有自己的误区,但究其实质,乃反映了西人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反省,实开了当今后现代主义的先河。梁启超批评的所谓“科学万能论”,就是指“理性万能论”;对于他关于东方文明当去“救济”西方文明的浪漫说法,虽不足训,也无须过于拘泥。重要在于,他敏锐感知到了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皈依战后欧洲新兴的“现代思想”——反省现代性。理解这一点,是理解晚年梁启超思想乃至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变动,必须把握的重要一环。梁启超依然是一位西方文化的热心传播者,只是较前不同,由于站立在了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基点上,他重新审视中西文化,提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的主张,从而构成了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良性制衡。显然,评说此期的梁启超,不能仅局限于新文化运动前后的中国社会背景,还必须将西方现代社会思潮的变动,同样纳入研究者的视域。如此,对梁的评价就会有新的境界。笔者在《梁启超与欧战》一文中曾这样写道“晚年的他不仅没有倒退,而且依然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尽管他称不上是这个新时代的引领者。由于梁启超是研究系的首领,他在此期政治上的积极作用被低估了。作为真诚的爱国者,他在国家与民族面临危难之际,始终申明大义并作出了自己独有的贡献,是应当看到的;他站在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上,对新文化运动发挥了制衡的作用,扩大了后者的内在张力,从而助益其内涵愈趋深化。如果我们注意到,反省现代性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成为了李大钊、陈独秀诸人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必要的思想铺垫,那么,我们对于梁启超的许多思想主张,就不应再作简单的理解了。对于这一点,似乎学界尚未认真予以关注……当然,梁启超虽然对于俄国革命与社会主义思潮深表同情,但他始终难以逾越改良的范畴,这影响了他的视野,即缺乏对战后世界尤其中国社会发展更为深刻的观察与把握……低估了战后中国社会正在酝酿着的深刻巨变,因为其时正有一班年轻人已在着手创建中共,关乎中国命运开天辟地的历史话剧即将揭幕。”^②

第二,恩格斯说“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③这是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到1849年德国革命失败教训,批判资产阶级背叛革命时说的话,意在强调看一个人,听其言还需观其行,要提防言行不一的伪

① 《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2页。

② 郑师渠《梁启超与欧战》,《历史教学问题》2014年第5期。

③ 《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4页。

君子。人们也多从这个角度引用这句名言;但是,实际上它还同样观照着另一种情况:对一个人自谦的话,同样也需要客观分析,听其言而观其行。这在不悛自我反省的梁启超身上,尤其显得重要。他常说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政治上如此,学问上也是如此,陷于前后矛盾。有论者即因之强调他“流质多变”“善变”,甚至断言“其为人之行动,稍失于反覆无常,未免缺操守,失人望。”^①在早年“左”的思潮影响下,更有人作这样的引伸“梁启超这个人的思想,是最难研究的。难就难在他大活动于一个空前变化的过渡时代,著作最多,无所不谈,思想既极复杂,而又成为一个经验丰富,天下闻名的政客,最惯于也最长于玩弄政客手法,经常披着许多漂亮外衣,喜说两面话,真假主客混在一起。我们一不小心,便会上了他的大当,或者终感摸不到他的头脑。”^②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读。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谈到上述的不足时,紧跟着便有这样一段话“启超与康有为最相反之一点,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其治学也亦有然。有为常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启超不然,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故有为之学,在今日可以论定;启超之学,则未能论定。然启超以太无成见之故,往往徇物而夺其守,其创造力不逮有为,殆可断言矣。”^③这固是自谦,但何尝不可以说是自得!如果说,这仅是在学术观点的层面上回应批评;那么,在一次讲学中,有学生当面问他怎样看待时论对自己多变的批评时,他的从容回答,就是从政治层面上作出了明确回应“但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决不是望风转舵,随风而靡的投机者。”“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我一生的政治活动,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没有什么个人打算”。“顾亭林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假如国之不存,还谈什么主义、主张呢?还谈什么国体、政体呢?总之,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批评,我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一个而已。”^④质言之,所谓“流质多变”“善变”,只是表象,未必就是任公的弱点;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恰是他的长处。如上所述,陈旭麓以为梁启超变中有常,就是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李华兴则强调爱国是其不变的初衷,这才是更本质和公允的观察。此其一。

梁启超也常反省自己因“学问欲极炽”,兴趣点常转移,结果造成所得不深,甚至对女儿说“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⑤一些论者对此缺乏具体分析,往往以偏概全,给梁启超贴上了为学“肤浅”“有量无质”的标签,大失公道。例如,梁漱溟说“任公学术上的成就,量过于质”,“其一生所为学问除文学方面(此特重情感)外,都无大价值,不过于初学有启迪之用”。^⑥胡适也说,“他的影响甚大而自身的成就甚微。近几日我追想他一生著作最可传世不朽者何在,颇难指名一篇一书”。^⑦其实,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是梁启超当年写作大量的作品,是出于宣传民主政治与传播西方学说的现实需要,是通俗读物,原非学术著述。若要求它“深”,还能成就当年的梁启超吗?缪凤林评论说:论梁的贡献,民国前的“宣传较浅薄,而影响最大”;晚年“讲学较宏博,而收效最微”,^⑧可谓一语中的。实则,梁自己已经回答了这一点“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

① 王森然《梁启超先生评传(节录)》,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4页。

② 蔡尚思《四论梁启超后期的思想体系问题——读陈旭麓同志的“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③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81页。

④ 李任夫《回忆梁启超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417—419页。

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281页。

⑥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5页。

⑦ 《胡适全集》第31卷,日记,1929年2月2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28页。

⑧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15页。

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①既成思想界的陈涉,何“浅”之有!二是梁启超虽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却不容贬之为“杂家”。作为学问家,他的成就集中于史学,早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研究》等及晚年《清代学术概论》等著作,都是公认的学术精品。不仅如此,他开近代史学的先河,更功不可没。缪凤林说,任公“实开史学界无数法门”。^②陈旭麓也说,他“特别是为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建立了一个体系”。^③于新史学有开山之功,学术精品迭出的梁启超,却被人冠以“浅薄”“有量无质”的谥号,岂非咄咄怪事!此其二。

1920年初,梁启超游欧归来,又自检讨说,此行一事无成,助益外交未达到目的,“自己学问,匆匆过了整年,一点没有长进”。郑振铎是敬仰任公的,但竟简单相信了他的话,评论说“在这一年中,真的,他除了未完篇的《欧游心影录》之外,别的东西一点也没有写;而到了回国以后,所著作,所讲述的仍是十几年前《新民丛报》时代,或第一期的著述时代所注意、所探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新的东西产生。此可见他所自述的一年以来‘一点没有长进’,并不是很谦虚的话。”^④如上所述,欧游归来,晚年任公跃上了反省现代性新的思想支点,展现了新的境界;其《欧游心影录》不仅风行南北,且成了记录欧战后东西方思想变动的绝佳记录,如何能说他“一点没有长进”“一点新的东西也没有产生”!至于下面张其昀站在国民党立场说的话,带着明显的偏见,自然更不足道了:梁启超“战后亲至伦敦、巴黎实地考察,究属走马看花,其所窥见之欧洲,殆属皮相之见,其轻视西洋文明,与《新青年》派之轻视中国文明,诚所谓过犹不及”。^⑤

第三,列宁说“出色地坚持哲学史中严格的历史性,反对把我们所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思想的‘发展’强加于古人。”^⑥所谓“严格的历史性”,不仅指研究者当具实证精神,实事求是,不能作过度解读,将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古人;同时,也是包含了这样的史德诉求:保持“情感”中立,不能因自己的情绪影响对历史人物的客观评价。但是,遗憾的是,在梁启超的评价上恰恰存在这种倾向。1943年梁漱溟发表《纪念梁任公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年轻时既无引以为傲的学历,籍籍无名,蔡元培不拘一格,将之引入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确是反映其知人之明。后来梁氏终因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而名满天下,故蔡于他有知遇之恩。而梁漱溟因其父在梁启超民初归国后,曾“四次往访不得一见,两次投书亦无回答”,^⑦受到了怠慢,不免存有心结。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纪念梁启超的文章,却采取了将蔡、梁二人处处加以对比的写法,扬蔡而抑梁,明显流露出了个人的恩怨情绪。他说:二人虽同是伟大,“然而其所以伟大却各异,不可马虎混同”。梁启超小蔡八岁,成名却远早于蔡;但他“缺乏储蓄深厚之致”,故其思想“亦不能绵历久远”,“他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在空间上大过蔡先生,而在时间上将不及蔡先生,亦由此而定”。^⑧平心而论,蔡、梁皆有大贡献于社会,但一定要说前者的影响将远胜后者,却不足信。至少从现在看,事实正相反。1973年,即在发表此文33年之后,已入耄耋之年的梁漱溟重拾旧文,又写下了《写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之后》,虽称梁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10集,第281页。

② 缪凤林《悼梁卓如先生(1873—1929)》,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0页。

③ 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第290页。

④ 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82页。

⑤ 张其昀《悼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21页。

⑥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8页。

⑦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3页。

⑧ 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0页。

启超能反省自己依傍军阀的“罪恶”，“卒自悔悟是有良心不昧者”，与康有为、杨度“悍然作恶者”不同，“自有可原恕”；但仍以严厉的口吻，斥其“情感浮动”，终是“学问上不能深入的人”，一生学问，“都无大价值”。^①较之前文，话说得更重，无异于将任公一笔抹杀了。可见其心结，老而弥深！张荫麟恰成相反的例子。他17岁时曾大胆批评过梁启超的学术观点，后者不仅不生气，反而称赞他是天才，并成了忘年交。因之，任公对他而言，同样有知遇之恩。也因是之故，他对别人批评梁启超的意见，不免做了不明智的袒护。例如，梁启超于民国后两度入阁，多遭人诟病，但张荫麟却说“任公入民国来政治营构之无成，非尽关人事，亦有天焉。”又如，为强调梁启超著述的成就，他这样说道“若《欧洲战役史论》，元气磅礴，锐思驰骤，奔转走石，飞眉舞色，使人一展卷不复能自休者。置之世界历史著作之要，以质而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莱、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曾试自操史笔之人，读此等书而不折心者，真无目耳。”^②将《欧洲战役史论》说成世界名著，甚至认为读此书而不为倾倒者，是有眼无珠！这明显是情绪化了，没有可信度。梁、张评价的对象都是同时代关系密切的师友，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自属不易；但是，就是面对不曾谋面的历史人物，如龚书铎先生所言，研究时间长了也会产生某种“感情”与“偏爱”。^③故“卓绝地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固是我们评价近代历史人物必须信守的底线，但真要做到，又谈何容易！

著名史学大家何兹全先生曾于2003年预言说：唯物史观现在被人冷落了，但它“仍然是最先进的历史科学的理论”，不用多久，“会复兴，为历史学家再接受。时间会多久，不好说，十年、二十年吧！”^④先生的预言何其准确！今天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的指导地位已然恢复，且愈加强固，相信在它指导下，近代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将展现新的繁荣局面。

关于客观评价近代商人的几个问题

朱 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近30年来，近代商人与商会的研究受到史学界重视，相关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但对于如何客观评价近代商人，仍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值得商榷与探讨。由于近代中国在很长时期工商不分，不仅工商业者自称为商，社会舆论往往也将工商业者统称为商人，所以本文所称之商人实际是指工商业者。另外，本文并非针对学术界评价单个商人的观点与结论进行商讨，而是在整体上就若干较为常见的说法谈一点不同意见，敬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近代商人有无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

近代商人长期饱受批评与指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说他们缺乏政治思想与政治追求。绝大多数论著认为商人只专注身家财富增长，唯一的追求是利润。他们害怕社会动荡，故而不关心政治变革，在政治运动中趋于保守软弱。就表面情形而言，对商人的这一批评似乎并不为错，但也不乏可商讨之处。

① 梁漱溟《写在〈纪念梁任公先生〉一文之后》，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265页。

② 张荫麟《跋〈梁任公别录〉》，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第139页。

③ 龚书铎《5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④ 《我所经历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何兹全文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601、602页。

追根溯源,对商人不关心政治的批评并非始于当今学术界,其实早在近代即已有之。民国元年工商部在京召集全国临时工商会议,各地商会以及其他工商团体均派代表出席,并在开幕式上邀请梁启超、杨度等社会名流发表演讲。梁启超在演讲中除阐述发展实业必须解决资本、组织、人才三大问题,还特别强调政治与实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举凡“政治不良之国,产业必永无发达之一日”。前清由于专制体制的限制与约束,人民无权过问政治,现为共和国体,人民可以而且应当参与政治,以尽国民之责。梁启超还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之一语,以为安分守己即是一人之道德,不知己之范围有宽有窄。中国工商界之人,现已范围过窄,以为一身而外皆非己有,不知一团体一社会一国家,皆一己与焉……守社会之己,国家之己,公司之己,则其社会也国家也公司也,未有不发达者。中国从前政治种种腐败,皆因不知此理。”因此,工商业者应该关心政治改良,“奋起其监督政府之能力,而活动于政治范围之中”。^①梁启超批评工商界存在的最大弊端为“安分守己”,其实就是批评工商业者不关心政治。

梁启超所说之工商界最大之病莫过于“安分守己”,如若换一个在近代商界十分流行而广受批评的说法,即是“在商言商”。学术界通常认为,“在商言商”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只专注于商事,不过问政治,这是商人缺乏政治责任感的典型话语。确实,商人在许多场合都曾毫不隐讳地主动声称其“在商言商”的态度与立场。例如在反对“二次革命”时,上海商界领袖就曾多次表示“商人在商言商”,以维护实业、发达商务为唯一宗旨,“赣省变起,商业受害”,所以“沪上商界均不赞同”。^②故而革命党人创办的《民立报》公开批评商人这一眼光短浅的举动,并非全无依据。

然则不应忽略的是,从清末至民国,近代商人也有积极参与一些政治活动的表现。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待同一政治事件,各地商人常常有不同的态度与行动,需要进行区域与个案考察,否则就会得出失之片面的结论。例如在清季国会请愿这一政治运动中,一方面确有商人与商会表示“商会应办商务,他事不应办,国会事重,商人不够资格,更不能办。”有的还声称商会“不但不必办国会,商界以外之事均可不办”。^③如果仅仅以此为依据,很容易得出商人不关心也不参与国会请愿运动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也有许多地区的商人与商会积极参与了国会请愿运动。上海华商联合会办事处曾向各地商会发出《为国会事公告海内外华商联合请求书》,多方阐明商人应“尽立宪国民之义务”,参与这场政治运动。此一呼吁得到许多地区商人与商会的响应,1910年6月立宪派发起第二次请愿,商会也选派代表参加。不仅如此,请愿代表还“承数十万商民之委托”,向清政府提交三份敦请速开国会请愿书。由此表明商人并非全都不关心政治问题和不参加政治活动。

另有论著认为近代商人只是偶尔关心和参与政治活动,此系商人之“变态”表现,其“常态”行为则是信奉“在商言商”原则,而“变态”表现不足以说明商人有政治思想和政治追求。所谓“变态”与“常态”之说,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如果类似表现只有为数很少的一二次,我们或许可以称之为“变态”行为,但如果持续发生则显然不宜视之为“变态”。揆诸事实,不难发现在民国时期商人和商会关心并参与政治活动的表现并不少见。1913年5月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起调和党争,被视为“商人维持政局,为吾国韧举”。^④到20世纪20年代,商界中的有识之士已意识到“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⑤有的还提出处此危急之秋,“倘仍在商言商,置

① 《梁启超君演说》,工商部编《工商会议报告录》第1编,“开会式及演说”,1913年印行,第23页。

② 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编《上海总商会议事录》(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

③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61、2360页。

④ 《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1913年10月,“纪事”,第6页。

⑤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2号,1923年2月,“言论”,第6页。

国事于不问”商人将“无立足地矣”。^① 1921年上海商会提出废督裁兵主张,同年10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与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海举行全国商教联席会议,公开发表对内对外宣言,并向各省议会及各公团发起召开“国是会议”。次年5月,“国是会议”在上海总商会议事厅隆重举行。无论商教联席会议还是“国是会议”,讨论的议题都是包括政治在内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事项。1923年6月,直系军阀曹锟发动政变,上海总商会公开否认政府有代表国家的资格,组织民治委员会应对非常时局,“更显出上海商人对政治的真态度”。^② 抗战胜利后,全国商会联合会又曾主动发起一场自称为“参政运动”的抗争行动,其主旨是力争工商界获得更多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名额,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

由上可知,近代商人对于政治有着双面态度与表现,一面是标榜“在商言商”,不关心政治;另一面又常常在商言政,参与政治。一体两面才是“商人政治”的常态,两面合一则构成了近代商人的政治性格特征。因此,评价近代商人是否具有政治思想与政治追求,不能只看到其中的一面而忽略另一面。^③ 同时还应注意,商人并非政治人物,不能苛求他们必须具备如同政治家那样的政治思想与政治追求,而且“商人政治”的特点,与促进工商业发展和保护自身利益的经济诉求紧密相联。

二、不宜简单贴上大商人与中小商人标签并作出不同评价

就商业资本和规模而论,当有大商人与中小商人之分。一般情况下大商人多指批发商,“即以向制造家购得货物而转批售于零售商之商人为大商人,而以零售商,即指直接以货物供给顾客之商店而言者为小商人”。^④ 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习惯于根据近代商人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以及政治态度,将其划分为大商人和中小商人两个不同群体,并以此为依据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评价。这种贴标签式的简单方式实际上存在着较多不实之处,也值得认真反思与商讨。

20世纪80年代,国内史学界对近代工商业者普遍使用的是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辛亥革命与资产阶级在当时也是近代史研究中最重要领域之一,成果十分显著。但当时的相关论著即普遍将资产阶级划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实际上类似于大商人与中小商人之分。认为上层在经济方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较密切的联系,因而反帝反封建的态度与行动都趋于保守妥协,其最为突出的表现是反对革命,支持立宪,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阶级基础。中下层则由于在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故具有反帝反封建的一面,同情并支持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在当时,是否支持革命,则是对资产阶级不同阶层给予肯定和否定评价的重要标准。近些年来,史学界出现了不见资产阶级名称的资产阶级研究这一新趋向,除了个别学者外,绝大多数都不再使用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而是代之以商人或是工商业者概念,但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了分别类似于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的大商人与中小商人之划分与评价。

认为资产阶级上层支持立宪、中下层支持革命这种贴标签式的结论,显然并不客观,与史实也不无出入。上海工商界若干上层人物,如李平书、李云书、王一亭、沈缙云、叶惠钧、虞洽卿、朱葆三等,在武昌起义之前已由支持立宪转为支持革命,上海光复后成立沪军都督府,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在都督府担任了重要职务。而资产阶级中下层支持革命的结论,至今也难以找到足够的具体事例予以证

① 《上海县商会开临时会员大会通告》,《申报》1923年6月25日。

② 《总商会今日大会》,《民国日报》1923年6月23日。

③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还应注意外部政治势力,以及“人事”对商人团体或单个商人的影响,参见冯筱才《名实·政治·人事——关于民初上海商人团体史研究的几点思考》,《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

④ 郑保华《大商人与小商人》,《烟兑月刊》第1卷第5期,1939年。

实。尽管我们不能以上海工商界若干上层人物支持革命的行动,就简单地断定资产阶级上层都支持革命,但却可以说明资产阶级上层都反对革命的标签式结论,是很值得商榷的。

如果追寻源头,同样不难发现对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以及对大商人和中小商人贴上不同政治标签,并相应做出不同评价的做法,与20世纪20年代轰轰烈烈开展的国民革命运动有着密切关联。在国民革命初期,国民党曾大力开展民众运动,其中包括商民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确定了商民运动的基本方略。该决议案将商人划分为“不革命者”和“可革命者”两大类。买办、洋货业、中外合办银行等大商人,与帝国主义存在密切关系,系“不革命者”,广大中小商人则是“可革命者”。在当时特定的革命年代中,“不革命者”即意味着反革命,所以对其策略是“揭发其勾通帝国主义者之事实,使彼辈不敢过于放恣作恶,更引起其他商人对于彼辈之仇视”。对于可革命之中小商人,则尽量“使之参加政治运动……以打破商民在商言商不问政治心理”,促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商人。另外,该决议案还认定商会和商团等旧式商人团体,均为不革命的大商人所控制,“受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之利用,作反革命之行动”。因此,必须“号召全国商民打倒一切旧商会”,“在本党政府下不准重新设立商团”。^①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案中,也有《商人运动决议案》,其内容大同小异,同样认为中小商人多倾向革命,并强调商人运动的对象主要就是动员中小商人,组织中小商人反对大商人的妥协卖国与反革命行为。很显然,出于推动革命发展的需要,在国民革命初期国共两党都为大商人和中小商人打上了政治标签,而学术界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有意无意受此影响,也长期认定资产阶级上层反对革命,中下层支持革命,现在迫切需要打破这种政治标签,依据史实重新予以全面考察和深入研究。

除此之外,多年以来史学界对近代上层商人的另一个否定性评价,是普遍认为上层商人长期垄断了商会这一重要工商团体的领导权力,导致商会不能维护中小商人的利益。尽管商会的领导人从表面上看是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但无论是清末的总理与协理,还是民国时期的会长与副会长,实际当选者几乎都是工商界的上层商董,中小商人无一人获此殊荣。而上层商人之所以能够长期控制商会的领导权,主要是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和人脉资源,并多方运动排挤中小商人,从而得遂私愿。就相关史实而言,近代各级商会的领导人确实都是由当地实力雄厚且声望素孚的上层商董担任,基本上没有中小商人。但是,对这种现象也需要客观看待,不能简单地因此而指责上层商董并予其否定评价。

首先,上述批评预设了一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前提,这就是上层商董都处心积虑觊觎商会领导职务,事实却并非如此。尽管商会是近代工商各业联合组成的重要工商团体,具有“登高一呼,众商皆应”的巨大号召力,能够出任商会领导人也就意味着成为当地工商界领袖,但其实多数上层商董却并不愿意担任商会领导人。根据台湾学者李达嘉对清末民初历届上海商会当选领导人的具体考察,我们得知几乎所有当选者都曾力辞不就。其提出的主要理由,一是才识有限,不能胜任;二是自身业务经营繁忙,无暇他顾;三是身体状况不佳。第一条理由当然是自谦的表示,第二三两条则是不愿就任的实际原因。虽然多数当选者在商会全体理事一再劝说下勉强上任,但也不乏最终未就任而不得不改选他人的事例,而且这种情况并非仅限于上海商会。^②

其次,当选商会领导人者均为具有较高社会威望和影响力的上层商董,应该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商会的重要功能除联络各业,调查商情之外,还包括“通官商之邮”,需要经常与官府沟通联

^① 《商民运动决议案》,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393页。

^② 李达嘉《上海商会领导层更迭问题的再思考》,《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9期,2005年9月。

络,有时为保护工商业者利益不得不多方与官府斡旋甚至是抗争。无论是工商界内部的联络,还是与官府斡旋与抗争,都需要有威望有影响力的上层商董出面担纲,才能获得较好的效果。如果是由名不见经传的中小商人出面,既无威望又无影响力,不仅官府不会予以重视,恐怕在工商界内部也难以服众。所以,通过投票选举的商会领导人均为上层商董是预料之中的结果,这种现象不仅在近代商人社团中普遍存在,即使是现今也概莫能外,并不影响商会维护整个商人群体的利益。

需要附带说明的是,近代史学界虽将近代商人划分为大商人和中小商人,并对中小商人给予肯定性评价,但实际上长期以来却一直是对大商人研究多,对中小商人研究少。其主要原因,大概是由于有关大商人的史料较多,也较易搜集,而有关中小商人的史料极为少见。今后亟需加大力度挖掘中小商人史料,开展相关研究。笔者最近查阅《申报》,发现九一八事变后该报的读者通信栏目,即有许多不知名的中小商人和店员来信,就抗日救国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向编者请教遇到的各种疑惑,利用这一史料开展相关研究,对于弥补抗战期间中小商人研究的薄弱肯定有所帮助。

三、如何客观看待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的表现

自1905年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之后,抵制洋货一直是广大民众在反帝爱国运动中采取的一种重要斗争手段,尤其抵制日货几乎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在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商会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影响。史学界早期对抵制洋货运动的研究,大多对商人有所忽略,后来虽有所肯定,但仍强调商人在抵货运动中软弱与妥协的一面,并多有批评与指责。一是谴责在抵货运动中仍有一部分奸商不顾民族大义,暗中私进私售洋货,牟取暴利;二是批评商人在抵制洋货运动中不能始终如一坚持到底,遭遇经济损失与其他压力后即趋于妥协,致使抵货运动最终无法达到预期目标。

无庸讳言,在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中确有一部分商人乘机牟利。他们利用洋货受到抵制,价格下降,私进私售洋货。这种“只为个人图利,不顾国家存亡”的行为无疑有损民族大义,当时即受到社会舆论的批评和爱国人士的指责。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中,激进的爱国市民通过《申报》读者来信栏目,“有主查得后将货焚毁者,有主将该奸商拘禁者,有主令游行以示辱者,最激烈者,主张明杀或暗杀”。^①该栏目编辑则在回复中并不赞同以各种违反法律的激进方式处罚私进私售日货的商家,尤其不能“明杀或暗杀”。^②在相关学术论著中,虽然没有类似对待私进私售洋货商人的激烈看法,但如果一味强调商人私售洋货,破坏抵货运动,忽略多数商人积极参与抵货运动,也存在片面之处。

在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中,绝大多数商人都积极投身其中,宁愿承受暂时的经济损失,显示出与其他社会阶层同样的爱国热忱。他们当中既有大量的中小商人,也不乏上层商董。例如曾担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的曾铸(字少卿),以极大勇气领衔发起抵制美货运动,署名电告清朝商部“众商拟相戒不用美货,暗相抵制”,并通电全国各埠商会请予响应,“以伸国权而保商利”。^③随后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勃然兴起,曾铸在面临来自清政府压力与各方质疑时又向国人阐明“政府虽欲阻止,恐亦无从措辞。阻止之道,充其量不过阻止开会而已,不能强令人人定用美货也。”^④当个人生命安全遭遇

① 《五告读者通讯诸君》,《申报》1931年12月8日。

② 《问私售日货的奸商可否枪毙》,《申报》1931年10月28日。

③ 苏绍柄编辑《山钟集》,上海鸿文书局1906年版,第27—28页。

④ 《曾少卿声明未允展期不用美货来函》,《申报》1905年7月7日。

威胁时,他更是坚定地表示“为天下公益死,死得其所”。曾铸的这种表现赢得舆论与各界的普遍称赞,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商界第一伟人”。一介商董在抵制美货运动中能有如此慷慨激昂的爱国之举,难道不应予以充分肯定?因此,既充分肯定多数商人在抵制洋货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同时也指出仍有一部分商人私售洋货,才是对抵制洋货运动中商人表现的客观评价。

近代中国抵制洋货运动连绵不断,时人统计仅抵制日货运动至1931年即多达9次。但是,每次抵制日货运动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与影响,却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对此,当时的商界人士也有所反思与检讨:“已往之屡告失败,言之实堪痛心,则今后之如何规划,益觉有妥谋改善之必要。”^①而相关论著则大多认为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私进私售洋货的奸商从中破坏,另一方面是因为参加抵制洋货运动的商人大多不能坚持到底,他们不愿蒙受自身经济损失,在抵制持续一段时间之后,强烈要求商会同意将封存的洋货贴上印签准予销售,由此使抵制洋货运动无形消解。总之,商人应对抵制洋货运动的失败承担主要责任。

将抵制洋货运动的失败原因完全归咎于商人,这恐怕也不是全面客观的结论。其实,抵制洋货运动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商人只是其中的因素之一。遭受抵制的列强国家,无论是英美还是日本,都无不采取种种手段向中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要求阻止甚至是镇压抵制洋货运动。中国政府则屈从于压力,要求各级官员明里暗里阻挠抵制洋货运动的深入进行。抵制洋货运动虽属民间性质的爱国行动,但不仅得不到官方的支持与保护,而且多方受到阻挠,自然难以长期坚持而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不能否认私进私售洋货的奸商,对抵制洋货运动的顺利开展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但这样的奸商并非商界中的多数,应该只是一小部分人。诸多爱国商家对这样的奸商也十分痛恨,予以谴责,商会并积极配合相关抵制洋货团体查禁私进私售行为。因此,私进私售的奸商固然可恨,但并不足以致使整个抵制洋货运动趋于失败。在类似奸商存在的情况下,多次抵制洋货运动依然获得了迅速发展,也证明其影响并没有大到想象的那种程度。

至于参加抵制洋货运动的商人为何不能将抵制行动坚持到底,直至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也需要予以全面的分析,做出客观的评价。平心而论,抵制洋货作为一场全民爱国运动,与国家主权与民族危亡紧密相联,关系到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如能达到目标全民将共同受益。但在抵制洋货运动中承受严重经济损失的却只有商人,其他阶级和阶层则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损失。而且在历次抵制洋货运动中,无论是国家还是社会从未见有弥补商人严重经济损失的任何举措。1933年6月,曾有一位爱国的洋货业商人致函《商人公论》杂志,述说自九一八事变后即坚持不再进售日货,结果亏损严重,已达破产关门地步,“因此苦闷极了”。^②在当时的商人中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始终无人帮助解决。时论已经意识到,商人是抵制洋货运动中的重要角色,但不应使其“独捐其大利而受大害也,皆当各尽其能力而分任”。^③我们不能要求商人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长期承受经济损失,正如同不应“迫使一小部分人牺牲自己眼前的利益去承担全民族的久远的历史责任”。^④否则,近代由商人扮演重要角色的抵制洋货运动,注定是难以长久坚持的行动。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凯)

① 周才良《抵制日货商店店员应负之责任》,《申报》1931年12月29日。

② 《商人的苦闷》,《商人公论》第12期,1933年6月15日。

③ 《论十八日商务总会各大商签允不定美货事》,《时报》1905年7月23日。

④ 王冠华《爱国运动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抵货运动夭折的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